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走出传统

ZOUCHU **CHUANTONG**

中国三农发展论

ZHONGGUO SANNONG FAZHAN LUN

卢荣善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走出传统

——中国三农发展论

卢荣善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秀霞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潘泽新

走出传统

——中国三农发展论

卢荣善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富达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2 印张 320000 字

2006 年 2 月第一版 2006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 - 5058 - 5366 - X/F · 4628 定价：21.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卢荣善，男，1955年生，安徽庐江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政府特约咨询委员、安徽省高校学科带头人、安徽省社科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安徽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金融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理论、“三农”问题。主持并完成国家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科研项目12项。在《光明日报》、《经济学家》、《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经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经济发展论》、《亏损经济学》（合著）、《市场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合著）等8部。

引 论

将本书定名为《走出传统》，是取深化中国传统农业和农村的技术和制度改造，使广大农民早日告别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入现代文明之意。在理论层面上，这是摆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和相关自然科学家面前共同的重大课题，而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更是责无旁贷，因为，改造传统农业自西奥多·W·舒尔茨于1964年提出之后，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关注与遐想：世界上两类境遇完全不同的农村人

作为一名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长期身处书山文海之中，却始终以其职业的眼光和特有的方式，关注世界和祖国的经济活动。学者的生活是寂寞的，大部分时间过的是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日子，但其精神世界则是丰富、多姿、跌宕、躁动，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多少年来，我经常陶醉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罗斯托、托达罗、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大师们所编织的经济发展模型的梦幻之中。眼前浮现的是：北美农场主喜携妻儿、驾车旅游；欧洲各国纵横交错的乡村公路、如诗如画的乡间庄园；走在大街上西装革履、信心十足的日本农人；与工商业精英比肩同行的墨西哥农场主；以色列建设规整的“吉布提兹姆”（kibbutzim）和“莫萨维

姆”(moshavim)^①；科特迪瓦郁郁葱葱的农庄（英语国家称其为明星国家）；冬日里，悠闲的台湾农业同胞坐在咖啡馆里与城里人谈论着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指数；韩国“新村运动”^②后的农村新面貌。威廉·伊斯特利书中描绘的一座乡村图景又一次在我的眼前重现：这是一座位于汉城东南50英里处的普通乡村，名叫Nae-Chan。这里具有所有现代社会的气息，铺了柏油马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可以收看卫星电视，安装了电话，只是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可乐瓶有碍观瞻。一家聚氨酯泡沫厂给村民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年轻的一代讨论的不再是政治或战争，而是体育运动、出国旅游和时尚服装。最近几十年营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代人比他们的祖辈高出了4英寸半。另一番情景是：巴基斯坦拉哈尔（Lahore）市近郊乡村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下水道、没有道路、处处蚊蝇飞舞的场景；居住在小茅屋中的印度家庭很少能在一天中吃上两顿饱饭，中午只啃一点甘蔗的人们；孟加拉国被鄙视的或被厌恶的穷人的悲惨（ghrino gorib）；赞比亚农村没有食物，一天只能吃一两顿饭，不讲卫生，苍蝇围着转，不能上学也看不起病，穿着破烂的脏衣服，营养不良，连饮水都困难，看起来就像野人，依靠野生植物和土豆度日的那些人；非洲马拉维吞食野生植物、玉米糠或石锌树皮的最穷的人；贝宁14岁，甚至12岁，靠卖淫为生，每次报酬只有一顿饭钱的童妓。再看住在巴西萨尔瓦多市东北部瓜皮亚拉村庄卡罗琳娜小姐的家境：她一家8口人住在一个泥巴和篱笆搭成的小棚子里，屋顶是棕榈树叶，她们的一日三餐就是黑豆、大米和木薯粉，饮用水里有时还有引发血吸虫病的虫子，泥巴墙上到处爬的蟑螂也携带有致命的查格斯病菌，最近的医生也

① 希伯来语，Kibbutzim译为大农场，moshavim译用小农场。

② 韩国政府于1971年初开始，发动了一场持续10年的乡村改造运动。政府出钱、出物、出建议，村民自主建设。涉及的项目包括生活设施、生产基础设施、增收项目、绿化、保健福利、精神启蒙等。新村运动使韩国城乡差距缩小，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高出城市工薪家庭，乡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三农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 10 英里之外。毫不奇怪，村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尽管他们也向圣乔治祈祷。她们相信上帝会把罪人变成狼人，相信田地的收成由月亮决定，相信月经期间的女人踏进田地会给庄稼带来诅咒^①。世界太大，不可能尽述，这就够了。囊中羞涩、手无缚鸡之力的经济学教授能够做点什么呢？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职业经济学家有义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完成了农业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能够丰衣足食，而农业国的人民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反而希望得到工业国的施舍？

二、来自中国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我时常欣喜于祖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城市在不断地扩展和美化，高耸的楼房、精美的广场和喷泉、宽阔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酒店和咖啡馆，大街上流淌的是无尽的轿车，男人们衣着光鲜，不时掏出手机与远方的亲人或友人对话，女人们打扮时髦，一脸灿烂……全国不少城市不让欧洲、北美，敢与“四小”比肩。如今的农村也不同于往日，数千万农民已陆续离土进城，还有更多的农民正在洗腿上架准备远行；小镇上的厂房到处可见，田野上的马达声时有所闻，石子和柏油公路上常有车辆通行，高压电线和电话线稀疏可见，农家别墅或成片坐落或零星可见……我还时而振奋于最高决策层所推出的三农新政：科学的发展观，城乡统筹，三年内取消农业税，贫困地区中，小学免费教育，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新政策，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然而，多少年来，我所见、所闻、所思最多的还是我们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业的脆弱、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艰难，时生无端的忧患、无尽的悲悯！现将 2005 年春对安徽一些农村地区调查的

^① [美] 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6、9、7~16、198 页。

见闻简单描述如下：2005年春，我回乡（巢湖市庐江县）探亲访友，有心趁机作一次农村社会调查。我们用了12天时间，沿途走访了无为县、庐江县和居巢区（原巢县）。据官方统计，这3个县（区），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356元、2263元和2570元。高于当年安徽省农民平均年收入2127元^①，在安徽省属中等偏上；略低于当年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2622.2元^②，在全国属中等偏下。我们参观走访了三地的县城、部分小城镇、村庄和农户，与农户兄弟有过数十次交谈。所到之处，我们为县城的发展感到无比的振奋，站在无为县城外的高处望去，简直就是一座都市，庐江县城亦不示弱，居巢区是巢湖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更不用说，其楼、其路、其车……蔚蔚壮观。县城以下的小城镇普遍表现平平，各处乡村的面貌与10年或2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后者主要表现在农民的住房、家电、少数电话和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的使用上（一般都是靠家庭成员打工收入购置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确实令人高兴！然而，当你走进村庄、贴近农民的真实生活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里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仍然是非常落后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公共地带树木砍伐殆尽、石子窄道至多通到村口，机动车辆勉强能通行，村内雨天道路泥泞，住房七零八落，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厕所和猪圈臭气难闻，居住数百人的一个村庄，见不到一个卫生院，没有一名医生，公共卫生、文化和体育设施一无所有。通过参观访问得知：农民的住房宽敞，吃、穿虽不太好，一般没有问题，灾年歉收能得到政府的救济也能挺得过去，但平时劳动太辛苦，且农业收入太低。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的老人和孩子是不幸的，由于家中青壮年长年在打工，留守的60岁甚至70岁以上的老翁、老妪白天种粮、种菜、养猪、喂鸡，晚上回来照

① 《安徽年鉴》，安徽年鉴社2004年版，第346、345、344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料孙儿孙女是普遍的。这些本来就需要别人供养、照料、慰藉、颐养天年的老人得不到他人丝毫的关爱，他们的精神是麻木的。留守的儿童从文盲祖父母那里只能得到一日三餐的食物和缝洗衣服的服务，得不到丝毫学习上的帮助；特别是遇到困难和矛盾时，得不到心理上的排解和支持。我们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少有孩提的天真和活泼，显得寡言而木讷，可想而知，他（她）们的童年是寂寞难耐的。在与农民的交谈中，他们流露出诸多的忧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担心自然灾害，担心买来的商品种子有假，担心发生畜禽瘟疫，担心农产品卖不掉和价格降低，担心政府政策会不会变和负担会不会加重等。还时常焦虑：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男孩长大建房成亲，家庭成员会不会生病，自己老了儿女能不能供养和照料。尤其是孩子读书、建房、医疗、养老成了很多农民的心病，因为他们的积蓄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些大问题。农民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实在太弱了。

我们还特别关注了另一群体，即失地农民。这些人过去是城郊农民，如今因城市扩张失去了耕地。3万~5万元的补偿款只够重盖一套房子，转眼便两手空空。政府没有给这些人提供工作岗位和保障，全靠打零工挣钱养家和供孩子读书，其工作和收入自然极不稳定，时有时无，有的则完全无事可做和无收入来源，靠向亲友借贷维持生存。这些失地农民与有地农民的绝大部分生活境遇差不多（前者可能心理压力更大），平时的吃、穿、住和供子女完成义务教育能勉强维持，但绝对经不起任何冲击，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如家庭成员特别是挣钱养家的劳动力一场大病，就会使一个家庭陷入绝境。现实情况是，这些地方无论是有地还是无地的农民，有很多人根本看不起病，只能是小病硬抗，大病等死。各个年龄段的肿瘤和其他大病患者不治身亡是极普遍的。我的一位至亲对我说：“我们这些穷人家，小孩和年轻人得病应该尽量医治，50岁以上得病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呢？”我们通过数日的走访，还弄清了一个问题，中国城乡的“黑医市场”为什么能大行其道，屡禁不止？原来

是黑医不上税，设备简陋，经营成本低和收费低，穷人看黑医是为了省钱，但其结果往往是饮鸩止渴，加重了病情，拖坏了身体，甚至丢了性命。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美国 R. H. 托尼的一句话：“有些地区农村人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① 我们身临其境的范围太有限了，但现代各种媒体提供给我们的类似信息则是大量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到两千多元的无为、庐江县和居巢区的很多农民尚且如此，那些人均年收入处在两千元以下的皖北、皖西和皖中农民自然不会好，推而论之，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的农村又能好多少？西部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肯定，即便在东南沿海发达省市的农村部分农民也有类似的处境。对这些有地和失地的农民来讲，有些看起来生活还过得去，但生存安全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这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其中的道理是一点即通的：农产品产量提高固然令人高兴，卖不出去或价格下跌怎么办？扩大畜禽饲养规模能够给人带来致富的希望，瘟疫的代价由谁来支付？丰年丰衣足食，连续的旱涝谁能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各种负担虽然是适当而又固定的，但农民的收入是可变的，在农户收入减少而负担不能相应减轻的情况下，谁能保证农民不发生阶段性的贫困？失地农民打工每天的工资收入虽然大大高于种地的收入，但在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又是完全可能的；全家成员身体健康时可能生活幸福而美满，但一旦有一个成员特别是挣钱养家的主要劳动力生一场大病，且拖延日久甚至死亡怎么办？如此等等。归根到底，说明了一个问题：生产、生活保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何等的紧迫和重要！

^① 转引自[美]詹姆森·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三、中国发展的大主题：加速三农发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工农、城乡在总体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但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所拉大，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必须摒弃刘易斯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即继续单纯地扩张城市现代部门，以此来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待掏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达到一个“商业拐点”^①后再发展农业和农村（在达到曲线拐点之前，农业单纯是城市现代部门廉价劳动力的供给部门）。刘易斯发展模式既缺乏起码的社会公平，更损害发展的整体效率。从公平论出发，（1）不平衡发展战略只能实施于一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而不能长期以牺牲一部分国民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国民福利的提高；在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上，农民对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的贡献是巨大的，如今应当更多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我们的既定发展目标是：实现“均质社会”^②和全面小康，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而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则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从效率论出发，传统农业不能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对此，舒尔茨有过论述。他说：“当论及通过投资增加农业产量时，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实际已将有利可图的投资于他们能支配的农业要素的机会发掘殆尽。这意味着投资于农民长期使用的那些类型的农业要素的边际收益率是非常低的，低到无法激励人们储蓄和投资。传统农业经济增长代价太大了。通俗地说，这意味着增加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一些用于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农民已经用了几代的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对农业产量的增加帮助甚微，小到不能产生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收益率。”^③现阶段，中

① 又称“刘易斯转折点”。

② 指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同质化（都是现代化的经济社会）。

③ [美] 西奥多·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国的农业虽然早已不是典型的传统农业，但传统成分仍占据较大分量。若不及时深化中国农业改造，那么，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日见式微。(2) 不能形成现代要素和产出品的有效供给。如农村教育不发展，青年农民和农村儿童的素质不提高，就不能适应城乡非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农产品的供给同样如此，农业面对的是国内外的大市场，出口农产品的结构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国内市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日益走向高度化。而现阶段的中国农产品生产结构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中低档农产品多，优质农产品少，加工、包装、运输、保鲜技术水平偏低，食品农产品农药残留值高，污染较严重等。这些都需要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来改造现有的农业体系。(3) 农业和农村不发展，就没有对城市现代部门生产要素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对农业科技、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需求，对现代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的需求以及对交通运输、钢铁、化工等二级连带产业和产品的需求。(4) 将近9亿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缓慢，将严重制约工业产品的国内需求和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GDP翻番不可能实现。(5) 农业和农村贫困人口不消除，将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如贫困人口对森林的砍伐、过度捕捞和狩猎、擅自开发边际土地而造成水土流失等等。对此，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经指出：“破坏环境最严重的人就是地球上最富的10亿人和最穷的10亿人。”^①(6) 农民的生活境遇长期不改善，影响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定，造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恶化。

加速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村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前文提到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现实已经昭示着中国三农的前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改造三农的经验和绩效更给我们以启示和信心。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怎样遵循工业化和

^① [美]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第六版），黄卫平、彭刚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借鉴外国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凝神倾力，探寻出中国三农发展的道路或途径。在这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H. 孟德拉斯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论述给了我们最初的启示。孟氏认为，“只有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① 孟氏同时问道：“为什么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向工业国家乞食？”后面这句话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也不符合事实。至少中国自己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没有向工业国乞食。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孟氏所提出的用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改造农业和农村的思路是正确的。它代表了工农、城乡二元经济国家三农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概括为：用现代城市工业文明改造三农。就是在同一年（1964 年），舒尔茨教授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改造传统农业》，于 1993 年又出版了他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发表的论文集——《报酬递增的源泉》。在这两本书中，舒尔茨有关论述的大意是：农业也能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但传统农业不行，因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实际已将有利可图的投资于他们的农业要素的机会发掘殆尽。这意味着投资于农民长期使用的那些类型的农业要素的边际收益率是非常低的，低到无法激励人的储蓄和投资。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了。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对传统农业加以改造，而改造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如何才能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呢？舒氏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1）建立一套适合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② 我的理解是，舒氏实际上讲的是用市场制度和现代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与孟氏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 [法] 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② [美]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译者前言 VI。

四、本书要义

欧美学者的论述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并且带有概括性和方向性，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同样有启迪作用。本书正是从孟德拉斯、舒尔茨等人所指明的方向出发，来构建体系框架的，即运用现代工业的制度和技术改造中国三农，花15~20年的时间解决中国三农中的主要问题，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的一体化和经济社会的均质化。全书分引论和13章，引论为“点睛”而作。正文可分5个部分：第1、2章对农业发展阶段的论述是全书的铺垫和逻辑起点；第3、4章是对中国农业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第5、6、7章对农业技术、专业化、产业化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农业技术与产业组织问题；第8、9、10、11章集中论述了中国工业化战略的调整和小城镇非农产业，其中对后者的论述是选择的，目的是有意避免与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第12、13章研究农民问题，即增加农民收入与中国农民阶层的演化趋势。

在写作本书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理论创新的精神，因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书中的新意和创见性观点虽然不够成熟，但却处处可见。现择其要如下：（1）从舒尔茨的农业发展阶段论出发，对过渡型农业和中国农业过渡型的实证分析（第1、2章）；（2）对中国农业中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大胆提出了这种农业微观经济体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非适应性，并对未来中国农业微观基础模式作出了规范性设计（第3章）；（3）对农村地产权经营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第4章）；（4）对人的时间经济价值的提高可能导致中国农业技术变迁路径的探索（第5章）；（5）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所构建的中国农业生产专业化分工的理论模型（第6章）；（6）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运用到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构建中（第7章）；（7）第一次提出将中国工业化的重心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并由此展开了一系

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如产业的城乡分工与重组、资源与有关产业的下移、县域非农产业的结构模式、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在县域内消化等（第8章）；（8）对小城镇非农产业结构特殊性的揭示，并对其演化或高度化趋势作出预测，其中对小城镇第三产业的论述尤为别开生面（第9章）；（9）针对中国的国情，适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M. 胡佛的区域经济理论，对农村不同区域非农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依据作了初步的探求（第10章）；（10）在农村非产业区位选择问题上，不是简单地指出非农企业必须进入小城镇，而是首先对不同产业类别和一定农村区域中的不同区位进行分类，然后，不同产业对号入座地进入适宜自己成长的区位，同时提出了“7个产业定位原则”（第10章）；（11）运用西方城市经济学原理，从正、负外部经济效果入手，论述了农村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小城镇的发展（第11章）；（12）在农民增收问题上，首先对流行的理论观点和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论，指出其得失，然后提出纯农户增收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第12章）；（13）中国农民职业化命题虽然不是我第一次提出，但运用数万字的篇幅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的可能尚无先例。在研究这一问题上，我从H. 孟德拉斯那里受益良多，但我研究的是中国农民问题，因此，通篇内容都是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一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现阶段，中国农民身份化特征的理论描述；对农民职业化的一系列质的规定；对中国农民职业化演进趋势的揭示。本书的最后部分，在对未来农业结构走向作出预测的基础上，大胆地设想：在今后15~20年内，“中国农民”这一经历了数千年沧桑的一群人，有可能裂变为市民、小城镇工人、农业企业家、农场雇工、现代农业兼业者和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等6个社会阶层。细心的读者将会看到，我的所有结论都是出现在大量考察、小心求证之后。同样如此，我对中国农民演化、裂变、终结的判断，是建立在广泛的国际考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变迁，农民的分化已初显端倪的基础之上的。其实，研究这一问

题是我在专业上的僭越，社会学家比我有更多的发言权。

中国三农发展，本身就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的问题，而它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所有问题。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经济学者，强攻这一问题，常生力不从心之感。书中的缺点、偏颇、浅陋、谬误可能不在少处，期待各位同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引论	1
第1章 传统型农业与过渡型农业	1
1.1 传统型农业的基本特征	1
1.2 传统型农业的增长	9
1.3 发展中国家的过渡型农业	17
1.4 非典型二元经济的内在矛盾	23
第2章 中国农业的过渡型	31
2.1 新中国建立前的传统型农业	31
2.2 中国农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迈进	35
2.3 中国农业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52
第3章 农业现代微观基础模式构建	56
3.1 一个权威性命题：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56
3.2 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65
3.3 双层经营与市场化的非耦合性	80
3.4 农业现代微观基础模式	86
第4章 市场、政府与农业新政	95
4.1 农场与市场	95